

# 文史资料选辑

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

编

第一五三辑

天下为公

孙文

漢卿世兄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K250.6  
53  
:153

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

# 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一五三辑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史资料选辑. 第153辑 /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.

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9. 3

ISBN 978 - 7 - 5034 - 2393 - 2

I. 文… II. 全… III. 文史资料—中国 IV. K25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19363 号

---

责任编辑: 吕潇潇 韩淑芳 封面设计: 张守义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印 刷: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: 102600

装 订: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: 102600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: 690 × 960mm 1/16

印 张: 13.25 字数: 200 千字

印 数: 7000 册

版 次: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6.0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## 决策内幕

---

- 1    **我亲历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件大事**  
       ◎ 徐匡迪
  
- 8    **一个重大的决策**  
       ——记邓小平同志在大庆油田发现前的一次重要谈话  
       ◎ 翟光明
  
- 17   **“洋浦风波”的前前后后**  
       ◎ 王峻岩

## 往事追忆

---

- 27   **深圳在政治架构方面的探索和深圳市政协的成立**  
       ◎ 周溪舞
  
- 47   **我在东莞改革开放中经历的几件事**  
       ◎ 黎桂康

## 文苑艺林

---

- 64     **大潮起落,汹涌澎湃**  
——亲历学界改革开放 30 年  
◎ 陈 醉
- 76     **戴爱莲:现代中国舞之母**  
◎ 姚珠珠

## 人物春秋

---

- 80     **忆周惠同志和内蒙古农牧业改革**  
◎ 田聪明
- 90     **陆平与刘居英兄弟的传奇人生**  
◎ 雷风行

## 史海钩沉

---

- 131    **上海市政协推动落实政策纪实**  
◎ 范征夫
- 144    **苏州曲园的新生**  
◎ 沈伟东
- 151    **小岗村“秘密契约”的内部新闻**  
◎ 李 超

## 委员园地

---

- 160 在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的十年

◎ 王楚光

- 180 深情回望 1978

◎ 杨国桢

## 民族史事

---

- 186 鄂温克统一族称与鄂温克自治旗的成立

◎ 杜金善 杜 鹏

- 191 鄂伦春自治旗成立始末

◎ 孟 和

- 199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成立始末

◎ 铁林嘎

## 我亲历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件大事

◎ 徐匡迪\*

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年。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，重新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，带领亿万中国人民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。这30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代，也是我人生经历中最难忘的岁月。

---

1981年，教育部派我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。当时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，到国外学习和工作的人还不多。我十分珍惜这一宝贵的机会，努力参与钢铁冶金新技术的开拓，并旁听了宏观经济学等课程。1983年，我到瑞典兰塞尔钢铁公司，并做了两年多技术副总经理，在实践中积累了现代企业管理的经验。这些国外的经历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，它大大地开拓了我的眼界，为我后来在经济转型中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。

---

\* 徐匡迪，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，中国工程院院长。

回国后，经钱伟长校长提名，我出任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，三年后又被朱镕基市长任命为上海市教卫办副主任兼高教局局长。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，即从教学、科研工作转向政府部门工作。我十分珍惜已有相当基础的科研工作。经钱伟长校长与朱市长商定，我一周四天在高教局工作，其余三天回校带博士生及做科研。

1991年初，我随朱市长率领的上海市代表团访问欧洲。有一次在法国证券交易所，翻译的同志对可转换债券不了解，翻成了转型的债券。朱市长问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解释说，企业可先发债券，如果经营三年效果好的话，债券可以变成股票，成为它的资本金。朱市长听后不大确信，便用英文问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，结果法国人连声说对。事后朱市长问我：你是学工搞钢铁的，怎么会知道金融？我说，我在瑞典兰塞尔公司工作的时候，公司发行过可转换债券。通常，我们要承包一个钢厂投资项目，制造设备的时候需要融资，通过这一途径融资，成本最低。

在回国的飞机上，朱市长叫我过去，他说：“回上海后你不要到教卫办了，我现在缺少懂经济、特别是懂国际经济的人，你就到计委去工作。”我说：“不行，我可不喜歡计划经济的。”他听后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好啊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到计委去工作了。”他当时已经酝酿改革，要使上海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。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三个重大转折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我当计委主任以后没多久，朱市长就调到北京做常务副总理了，但他已为上海经济的转型奠定了方向。

1992年春节，邓小平同志来到上海，接见上海市委常委，我也出席了会见。吴邦国书记向小平同志介绍我说：“这是一位国外回来的教授，现在从政了。”小平同志说：“教授从政好啊！搞‘四化’需要有很多的教授从政。”我听后受到极大的鼓舞，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把自己的科技知识和对国外市场经济的了解，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，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。





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到上海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把徐匡迪介绍给小平同志。

## 二

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和最大的工业城市，也是计划经济最周密、最彻底的城市。1992年小平同志到上海考察工作时指出，“上海的改革开放搞晚了，今后要加快步伐”，并提出了加快浦东大开发的任务，为上海加快改革开放吹响了冲锋号。邦国同志、黄菊同志召开市委扩大会，传达小平同志讲话，号召大家思想更解放一点、步子更大一点。我作为上海市副市长兼计委主任，深感肩负的重任。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，应当从哪里开始着手呢？

我们计委一班子人经过讨论，向市委提出从三个方面推进计委自身的改革，得

到邦国、黄菊同志的支持。

第一个方面，计委转变职能，就要对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。过去，计委是最大的经济综合部门和审批机构，有着大量的审批权，劳动工资和物价调整的权力也在计委。它还是最高层的决策咨询部门，市委、市府制订的经济社会发展大计往往先要计委提出一个初步意见，供领导决策。我们的改革建议是：今后计委只研究总盘子，比如说35%用于工业技术改造，40%用于城市基础建设，还有25%用于社会事业，等等。如果市委批准了这一切块方案，那么计委就把相应的投资规模下达相关部委，具体项目则由各个部委审批后报计委备案。计委从过去的审批单位变成了一个督促落实的机关。这使计委很快从大量审批的矛盾中解脱出来，效率大大提高，也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，工作都活跃了起来。我们也有时间积极地跑中央有关部门，筹划建立起一批大市场，包括期货市场、外汇市场、黄金市场等。

第二个方面，承担起筹措上海发展所需资金的任务。为支持上海市大发展和加快浦东大开发的步伐，资金需求十分巨大，而上海市政府当时仅有37亿元可用财力，远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，筹措资金也十分困难。

朱镕基同志当上海市长时，曾向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借了两笔钱，建起了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。再要建桥怎么办？当时搞浦东开发，每天有10万辆汽车要过黄浦江，摆渡坐船从浦西到浦东需要40分钟，只有两个桥，一个隧道，显然是不够的。我们想到了借鉴国外BOT的办法，请香港的一家公司对两座桥的市值进行评估，然后向市委建议把这两座桥49%的经营权卖给香港的一个上市公司，即可筹到24亿元用来建第三座和第四座桥。同样，隧道也卖49%，可建造第二条和第三条隧道。之后，我们对沪宁高速公路和沪杭高速公路也采用了相似的办法。这样，我们就把现有资产盘活、投资规模放大了。

土地批租同样是旧城改造、筹集资金的大事。当时上海有350万居民住在市中心的棚户区，那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炸毁的废墟上居民自己搭建的。要重新建设城市、改善那里人民的生活，必须解决棚户区拆迁问题。

计委就提出土地批租的建议。先在城郊结合部盖起一大批经济适用房，供搬迁

的居民居住。搬迁以后，居住面积可扩大一倍。当时还没有产权的概念，提出一个口号，就是“舍小家为大家，共同建设新上海”。有差不多 100 万居民从市中心搬出去。

因为市中心的土地每平方米大约可以批租 8000 美元，而城郊结合部建居民小区的土地每平方米只有 50 到 60 美元。我们就利用这个差值筹到的款大搞市政基础设施建设。同时，市中心的工厂也都退二进三批租给外商去开发。很快，一批大商场、大办公楼就在市中心建起来了。市容及道路交通、市区绿化情况也迅速改观。

对于这一做法，当时有关部门，包括有的领导也提出了质疑，说这么搞是不是上海市中心又变成租界了，都是外商的楼宇、酒店、商场了。我们说，这不一样，旧上海的租界有治外法权，有行政管理体系，税收财政也不归中国，连警察都不一样。现在的行政管理、税务财政、公安巡警是中国的，外商只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投资经营，就像合资企业一样，而且一定年限后，批租期满时，土地和地上建筑都归还中国。最后，领导拍板决定，说可以试，先看三年，然后再做结论。在这以后的两年中，上海连年高速发展，上缴中央财政每年递增 30% 以上，最后领导也充分肯定了上海在率先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。

第三个方面，是放开价格。1992 年前，上海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和全国一样，都是由计划、物价部门规定的。经过一段时间酝酿，我们向市委建议，物价的市场化改革可先从水果入手，因为水果是温饱有余的人才吃的。

当时上海有一个果品蔬菜公司，它组织了一个大的批发市场，有一批人搞采购运输，但效益不好，还要政府补贴。我们试点的办法是果蔬公司只搞交易市场，只管挂牌价，而不管采购，而且挂牌价一定比长江三角洲的其他大中城市每斤高 5 分钱，货源则放开由个体户来经营。在市场经济中，商品总是向价格高的地方流动。仅半个月，全国的水果产品都来了，从新疆的哈密瓜、河南的西瓜，到山东的苹果，海南岛的椰子、香蕉，广东的荔枝。过去国家公司的采购员在产地采购后不随货回来，新疆的哈密瓜运到上海沿途损失 25% 到 30%；而个体户从新疆到上海是睡在哈密瓜上的，基本上没有损失。这一改革初战获胜后，接着进行了粮油价格放



开的改革。在1995年时，全国粮食和食用油的价格还是固定、统一的。当时有两个选择：一个是继续维持现状，由于购销价格倒挂，每年由财政补贴6000多万元。另一个是价格放开，粮、油价格随行就市，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将受影响。我们算了一笔账：上海当时共有三十几万低收入的群体，其中包括孤寡老人、下岗职工和支边支疆回来后没有合适工作的青年。如果每个月白送他们20斤粮食和半斤油，算下来还不到4000万元。所以我们建议，在实物帮助困难群体之后，粮油价格可放开，顺价销售，上海人民就能吃到最好的米、最好的油。后来随着发展，老百姓的要求不断提高，我们也不断调整政策，先是发食品券，自己到粮店选择领取籼米或粳米，后来为了制止倒卖食品券，干脆直接发补贴，自己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。这样，上海的基本生活用品价格就整个放开了。

价格放开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：上海的物价比周边地区高了。这引起了干部、群众的议论。物价高到底是好现象，还是不好的现象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、工资划一时，什么地方物价低，那个地方的人民肯定是安居乐业的，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什么地方物价高，而且工资也高，那个地方肯定是大家觉得比较好的地方。比如东京、纽约、伦敦和巴黎的物价都高。什么地方物价低呢？非洲那些贫穷国家的物价低，中国的老少边穷地方物价低。黄菊同志总结大家的讨论后，形象地提出要做到“三个一点”，即物价比周边地区高一点，工资也比周边地区高一点，工资的增幅比物价的增幅再高一点。有了这“三个一点”，上海人在物价较高、物资丰富的条件下也可以安居乐业。

现在回顾起来，从1992年小平同志到上海点燃了改革开放和浦东大开发的火炬，到我们在市委领导下解放思想，努力工作，用三年时间实现了三项重大改革，推动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大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，使上海市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为上海市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## 三

“人生能有几回搏”，我亲身参与这一历史性转轨过程并发挥一份作用，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。

我现在已进入古稀之年。回顾30年来经历的风雨，我感谢党的培育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机遇，感谢钱伟长校长、朱镕基市长、吴邦国书记和黄菊市长以及许许多多的领导和同事们。正是他们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，才使我有机会充分发挥我的知识和作用。我的生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，我将继续尽我的绵薄之力，为祖国、为人民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。



## 一个重大的决策

——记邓小平同志在大庆油田发现前的一次重要谈话

◎ 翟光明\*

1959年9月26日，正当全国人民张灯结彩、喜气洋洋地准备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的时候，石油工业传来了一个特大的喜讯——石油部在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高台子公社钻探的松基3井，第一次在我国东北地区喷出了工业油流。

作为一个石油地质工作者，作为一个大庆油田发现过程的历史见证人，每当想起那终身难忘的日日夜夜，我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。特别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在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，我们国家领导人的重大决策作用。正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，在我国石油工业十分薄弱的情况下，为我们的石油工业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，制定了战略部署。他审时度势，运筹帷幄，断然做出了石油工业战略转移、挥师东进的重大决策，并为我们指明了松辽、华北、四川、江苏等东部地区的主要战场……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很荣幸的是我有机会亲自参加了向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汇报，聆听了他的重要指示，我愿意把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介绍给广大的石油工作者和全国人民。

1958年，我已在石油工业部地质勘探司地质室工作。2月中旬的一天，唐克司

---

\* 翟光明，曾任石油工业部勘探司司长。

长（当时的地质勘探司司长）通知我到他办公室，要我和他一起准备一个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的材料，主要是全国石油勘探开发情况，特别是石油勘探的战略方向和部署意见。唐克司长详细谈了汇报要点，应该准备的各项资料数据，以及各种勘探开发图件。让我立即动手，在两三天之内准备完毕。接到这个任务，我又是高兴，又是紧张。我想，准备这样的汇报材料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！心情是非常激动的。唐克司长布置以后，我就日夜加班干了起来。

当时，石油工业部长是李聚奎同志，副部长是周文龙、李人俊、康世恩等同志。康世恩同志主管勘探开发工作，因出差在外，部党组决定由李聚奎部长、唐克司长去参加汇报。过一两天，唐克司长告诉我，让我和王纲道同志（地球物理工程师）也一起去。

盼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。1958年2月26日，国务院办公厅来了电话，通知我们27日上午赶到中南海居仁堂。当晚，我一夜都没睡好觉。27日一大早我就起了床，提前赶到办公室，清点了资料和图件。在去中南海的路上，我一直在猜测，到底是哪位中央首长听取汇报呢？

中南海居仁堂是一幢古典的中式建筑，里面十分宽敞，会议室陈设简洁大方，中间摆着一排会议桌，两边各有10多把木质软椅。进了会议室，我和王纲道同志就赶紧把各种汇报用的图幅挂好，等待着中央领导同志的到来。这时我们才知道是向总书记、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汇报。

大约过了十几分钟，邓小平同志来到了会议室。跟在他后面进来的还有三位领导同志，其中有一位将军，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余秋里同志。另外两位是孙志远和贾步彬同志。

李聚奎部长首先汇报了石油工业的总形势和一些基本情况，接着唐克司长详细汇报了玉门、克拉玛依、独山子、冷湖、延长以及其他各个地区的勘探开发情况。小平同志仔细听取汇报，一面不时地做着记录。当唐克司长汇报到人造油的生产情况时，小平同志插话说：“听说你们石油工业部有搞人造油和搞天然油的讨论。石油工业怎样发展，我看人造油是要搞的，并且下决心搞，但中国这样大的国家，当然



要靠天然油。”

小平同志这段话一针见血地道破了石油工业的要害。当时，石油工业部确实有发展人造油还是发展天然油的讨论。它的背景情况是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，石油工业部是唯一没有完成产量计划的工业部门。当时的天然油基地主要是靠解放前发现的玉门、独山子、延长三个油田，以及解放后1955年发现的克拉玛依油田。1957年，这些油田的产量仅有86万吨，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。而且，这些油田又都集中在西北地区，由于运输不便，对于急需用油的东北地区来讲，是“远水解不了近渴”。所以在大连、抚顺、茂名等地发展了人造油生产，其产量也达到了60万吨，几乎与天然油的产量“平分秋色”。由于当时勘探工作做得比较少，勘探技术、地质理论也还比较落后，加上一些思想认识上的问题，在这种背景下，一些同志产生了悲观情绪，认为中国的地质既不像美国的北美地台，又不像苏联的俄罗斯地台，发展天然油的前景不大，形成了中国贫油的想法。有的同志提出，与其打很多干井造成浪费，还不如把这些资金用来发展煤焦油和太阳能……邓小平同志指出：“中国这样大的国家，当然要靠天然油。”这就从战略发展上为我国石油工业指明了方向。从此，我国的石油工业开始走向了一个以发展天然油、天然气为重点的新阶段。

唐克司长接着汇报石油工业的队伍情况，提出，当前发展石油工业的主要困难是队伍力量薄弱，技术手段落后。当时，全国石油职工队伍仅有14万人，205个钻井队，大都是中、小型钻机，年总进尺52万米，地质勘探、油田开发的人数也很少。这样薄弱的力量，不要说在全国铺开，就连西北地区也只能集中在几小块地方开展工作，同全国的发展形势很不适应。听到这里，小平同志插话说：“现在你们的地质队和地球物理队可不可以加一番？轻便钻井机只有55个队太少了一点，中型钻井机只有140多部也太少了。石油钻机要自己造，可以和机械部商量一下，你们也要促进一下。要做1200米的钻机，也要搞3200米的钻机。套管、钻杆应当努力设法在国内解决。总之，一个是勘探队伍的问题，一个是钻机的问题，应该促进一下。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，你们打钻子（指石油钻井进尺）加一番行不行？”小平同志的这些指



示对石油工业技术手段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在国家计委和机械部的支持帮助下，石油工业部大力加强了队伍建设和装备建设，当年（1958年）的井队数就由205个增加到394个，接近翻了一番，年钻井进尺突破了100万米大关；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了地质研究和地震勘探，石油工业的职工人数由14万人增加到23万人，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。

唐克司长接着汇报石油勘探工作的规划部署。当汇报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勘探地区时，小平同志指出：“石油勘探工作，应当从战略方面考虑问题。战略、战役、战术总是要三者结合的。”“新疆克拉玛依可以搞一个300万吨的油田，你们规划1959年只出40万吨油，太少了。克拉玛依这个地方缺点是在国家西北边疆的最边上，离用油的地方远，怕运不出来。”“苏北要增加工作量，这个地方如果搞出油来，那对沿海一带很有好处。”“苏北交通很方便，那么美的地方，应该加速。如此类推，东北如何促进，四川如何促进，都应该考虑。把真正有希望的地方，如东北、苏北和四川这三块搞出来，就很好。对这些地方应该积极创造条件，在地质上创造一个打井的基础，可以三年搞成，也可以五年搞成，应该提出一个方案来。如果龙女寺钻出油来，四川石油工业就会‘跳’到前面，东北搞出来了也会‘跳’到前面。对于松辽、苏北等地的勘探，都可以热心一些，搞出一个初步结果。”唐克司长一边汇报，我一边做着记录，把小平同志的每一条指示、每一句话都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。这时时间已快到中午12点了。小平同志说：“好吧，今天先谈到这里，明天上午我继续听你们的汇报。”他站起来同我们一一握手。

2月28日上午，小平同志及余秋里、孙志远、贾步彬同志准时来到居仁堂。唐克司长继续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勘探工作部署。小平同志在汇报过程中和汇报结束时，对石油工业的战略发展方向又做了许多重要的指示。小平同志指出：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，东北地区能够找出油来就很好，把钱花到什么地方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总的来说，第一个问题是选择突击方向，不要十个指头一样平。全国如此之大，20、30个地点总是有的，应该选择重要地点先突击。选择突击方向是石油勘探的第一个问题，不然的话，可能会浪费一些时间。”“就经济价值来说，华北和